



中共党史珍闻录

ZHONGGONG DANGSHI ZHENWEN LU

◎ 白云涛 编著



SCPG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CHUBAN JITUAN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中共党史珍闻录

ZHONGGONG DANGSHI ZHENWEN LU

◎ 白云涛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珍闻录 / 白云涛编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0-08519-2

I. ①中… II. ①白…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通俗读物 IV. ①D2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9412号

ZHONGGONG DANGSHI ZHENWENLU

中共党史珍闻录

白云涛 编著

策划组稿	李洪烈
责任编辑	李洪烈 杨 娅
装帧设计	解建华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徐 英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sermchsf@mail.sc.cninfo.net
发 行 部	(028)86259459 86259455
业务电话	
防 盗 版	(028) 86259524
举 报 电 话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0.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519-2
定 价	36.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录

CONTENTS

所谓“陈独秀问题”的来龙去脉 001

- 一、所谓的“陈独秀问题” 001
- 二、还原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历史地位 002
- 三、关于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 006
- 四、关于陈独秀的“托派”问题 010
- 五、关于陈独秀的“汉奸”问题 017
- 六、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应进一步肯定 026

关于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之争”问题 029

- 一、朱毛红军的组成和“朱毛之争”的缘起 029
- 二、中央来信又来人，引发“朱毛之争” 033
- 三、林彪站在毛泽东一边 035
- 四、口舌争辩演变为笔墨之战 037
- 五、毛泽东抱病黯然离开 040
- 六、有“朱”无“毛”，形势不好 042
- 七、朱德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说必须打倒“陈毅主义” 044
- 八、有“朱”无“毛”，再现窘境 046
- 九、周恩来、李立三高屋建瓴，惊醒陈毅梦中人 047
- 十、中央“九月来信”，作出明确结论 051

十一、陈毅打倒“陈毅主义”，朱毛走到一起.....	054
十二、古田会议，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056
十三、历史的启示.....	058
中共中央从上海秘迁瑞金始末.....	062
一、白色恐怖中的红色中央.....	062
二、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红色中央危机.....	065
三、经共产国际同意，临时中央秘密向苏区瑞金转移.....	067
四、周恩来三易装束过险关.....	069
五、博古、陈云并行离沪，化险为夷进入苏区.....	071
七、林伯渠途中负伤，瞿秋白幸免于难.....	074
八、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诞生.....	075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	077
一、革命形势好转，“立三路线”抬头.....	077
二、王明反对“立三路线”，遭到“立三中央”留党察看处分.....	078
三、“钦差大臣”米夫来华，“反立三路线英雄”王明抬头.....	081
四、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罗章龙折戟，王明登上政治舞台.....	083
五、王明、博古主政，毛泽东遭批评被撤职.....	085
六、清除毛泽东影响：反“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公审萧 劲光.....	089
七、遵义会议：毛泽东崛起，博古让位.....	093
八、王明携“太上皇”之令返国.....	096
九、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以毛泽东为首”.....	100
十、延安整风，清算王明教条主义.....	103
十一、晚年王明，终老异乡.....	112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风波	114
一、从一介书生到中共领袖	114
二、受命留守, 不幸被俘	116
三、叛徒指认, 不幸暴露	119
四、出卖瞿秋白者何人?	120
五、拒绝劝降, 从容就义	122
六、《多余的话》: 瞿秋白的自我解剖	126
七、风起于青蘋之末	129
八、重评《多余的话》, 还瞿秋白清白	131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共两党争夺人才的较量	134
一、中共发布“五一”口号, 蒋介石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134
二、北平学者争夺战	137
三、张伯苓拒绝蒋介石, 接受周恩来	140
四、茅以升将计就计, 利用蒋介石的信任保护上海工业	142
五、蒋氏父子劝不动竺可桢, 反被竺可桢劝	144
六、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东躲西藏, 终于留下来为新中国服 务	145
七、古都北平, 群贤毕至	146
新中国成立后国共的几次秘密接触	148
一、首次接触: 1950年解放军攻台在即, 蒋派李次白赴大陆 谋和	148
二、第一次密谈: 中共派章士钊入港送信给蒋, 蒋介石派宋 宜山进京刺探虚实	151
三、第二次密谈: 毛泽东提出“一纲四目”, 蒋介石反馈“六项	

条件”	155
四、李宗仁归国，力促国共合作	159
五、第三次密谈：章士钊再度赴港带信，蒋介石密约毛泽东 访台	160
六、两岸关系拨云见日，峰回路转	163
梁漱溟顶撞毛泽东始末	164
一、北大相识，延安相交，彻夜畅谈，成为挚友	165
二、解放进京，来往密切，朋友成为座上宾	167
三、梁漱溟提出“九天九地”说，被误解为破坏工农联盟	169
四、梁漱溟为自己抗辩，当面顶撞毛泽东	171
五、长子一席话，惊醒梦中人	175
六、30年之后的感悟	177
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始末	179
一、毛泽东说：中苏分歧要从1954年算起	179
二、1956年：斯大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182
三、1957年：毛泽东二次访苏，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歧明显了	189
四、1958年夏：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中苏两党产生裂痕	196
五、1958年秋：炮轰金门事件，中苏破裂的导火索	199
六、1959年：赫鲁晓夫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很 恼火	203
七、1959年：苏美戴维营会谈，中苏北京吵架	206
八、1960年：赫鲁晓夫讥讽毛泽东是“老套鞋”，毛泽东说赫鲁 晓夫是“半修正主义”	213
九、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较量，中苏两党冲突公开	216

十、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破裂边缘握手言和	218
十一、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周恩来提前离会抗议，中苏两 党关系降至最低点	221
十二、苏共二十二大后，毛泽东断言苏共“变修”，中苏大论战 开始，两党关系破裂	224
十三、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原因及历史教训	227
毛泽东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232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亲密战友	232
二、分歧缘起：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国内主要矛盾问题	235
三、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	239
四、七千人大会，国内形势和工作认识上的分歧	241
五、“包产到户”问题，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246
六、“四清”运动，毛泽东刘少奇走向分裂	251
七、历史的悲剧与个人的悲剧	261
八、“相逢一笑”，拂去历史尘埃	265
中共“理论家”陈伯达政治沉浮记	268
一、大革命失败，别人脱党他人党	268
二、毛泽东和陈伯达：“哲学”的亲密接触	270
三、调任毛泽东身边，31年政治秘书生涯里地位不断攀升	272
四、“他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276
五、中共重要文件的起草者	280
六、疯狂的年代，罪恶的人	283
七、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风波，陈伯达开始失宠	287
八、折戟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政治生命	289

九、晚年生活和自省	295
《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修订与传播	297
一、毛泽东论个人崇拜，林彪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	297
二、《毛主席语录》应运而生	300
三、林彪的“题词”和林彪的“前言”	301
四、全国变成“红海洋”	303
五、因“红宝书”获罪的人们	308
六、“红宝书”时代的终结	310
主要参考书目	312
后 记	316

所谓“陈独秀问题”的来龙去脉

一、所谓的“陈独秀问题”

所谓“陈独秀问题”，实际上指的是陈独秀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问题牵延数十年，成为党史研究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陈独秀连续五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连选连任届数最多的最高领袖。

在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五届期间，党经历了初期成长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以及惨烈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为革命献身。

但是，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也有它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党的一些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上了“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九顶帽子。因为九顶帽子压身，又株连到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的不公正评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理论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随着历史事实的一个个澄清，那些加之于陈独秀头上的帽子一个个地摘掉，对于五四时期和建党时期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二、还原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前，虽然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并被认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还是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先后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时限比第一次讲话更宽，评价也比第一次讲话更高。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地位的评价出现了曲折的复杂的变化。

1951年出版的华岗所著《五四运动史》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俨然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居，但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资格登场的”，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责任“不得不落在当时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李大钊肩上，以及在当时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登场，但后来终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肩上”。另外，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由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对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评价，与上面所述大致相同。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在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如何处理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请示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这个报告的语气，已经完全是把陈独秀当做“反面人物”了。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对于评价陈独秀五四时期的历史贡献，起了很重要的导向作用。195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高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纠正一些党内同志的错误时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无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虽然不是讲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但痛斥陈独秀为“大叛徒”，将陈独秀与张国焘、高岗、希特勒、蒋介石、沙皇并列而言，如此强烈的倾向性，不可避免地在错误评价陈独秀政治地位的同时，对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功绩的评价起到了降低作用。

于是，此后至改革开放，关于五四时期的历史记述出现了“五四无陈论”的状况。台港学者强调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我们则强调李大钊和鲁迅。在那个时期，由著名学者胡华撰写的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泽东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1961年出版的国内权威工具书《辞海》，在“陈独秀”条目中，只字不提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而在短短的不足200字的介绍中，充斥着“鼓吹”、“投降主义”、“勾结”、“反党”等字眼，显然是把陈独秀当做反面人物来介绍的。

一些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打破陈独秀研究禁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在有关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据统计，1979年全年在《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和复旦大学学报等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研究陈独秀的论文有60多篇，其中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就有20多篇。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在1979年修订的《辞

海》中得到了体现。其中“陈独秀”条目有这样与以往不同的表述：“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名声，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者地位，但点出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在当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党报向人民大众披露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正面评价，为客观研究陈独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随后，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者大胆提出：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通过创办《新青年》发动起来的，陈独秀通过在组织上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而领导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当时是一位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领导下“听将令”行事的优秀战士。

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性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会上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重要贡献作了进一步肯定。同年修订出版的《辞海》，再次吸收了学术界、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之后，“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提法开始见诸报刊和著作之中。

进入21世纪，“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提法开始得到广泛认同。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北京青年报》开辟专栏介绍80位重要党史人物，介绍陈独秀的文章标题就是“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2002年出版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的《党史札记》中，有一篇《讲科学反迷信是党的传统：五四时期》，其中明确指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成为建党初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就是一位用科学反对迷信的冲锋陷阵的战士。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也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指挥所。”

此后，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接受，并且反映到各种党史、现代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中，甚至中小学历史复习题中也出现“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填充题，正确答案当然是“陈独秀”。

三、关于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恢复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历史地位，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重新评价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

但是，同样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陈独秀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上，出现了和否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地位一样的不公正评价。

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这样描述建党时期的陈独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其中“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至关重要，让人感觉当时党是选错了自己的领导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不但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不提陈独秀，只提李大钊，而且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闭口不提陈独秀。《中国革命史讲义》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政治氛围日益“左”倾，不但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基本功绩，还对陈独秀进行错误的批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还开了一门“陈独秀批判”课，并于1958年出版了《陈独秀批判》一书。在错误的批判中，陈独秀的建党功绩不但被抹杀，还被指斥是“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等等。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陈独秀不但成为“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还在“评法批儒”中被说成是“尊孔派”加以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开始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

1979年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60周年。在一系列的纪念五四运动和陈独秀问题学术研讨会中，不少学者打破禁区，开始肯定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功绩。有的学者指出：“陈独秀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绝不是偶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作了很大的贡献。那种认为陈独秀一贯错误，靠名声欺骗群众才当上总书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与有关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提出不要再提路线斗争，并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1981年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资料上批示：“陈独秀墓地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请安徽省委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同年8月18日，在建党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萧克将军讲道：“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即便他后期犯了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会上，萧克将军在谈到建党问题时说道：“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萧克将军还特别提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1982年，陈独秀家乡安庆市整修陈独秀墓的请求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和专门拨款。

党中央和老一代革命家对陈独秀态度的转变，对陈独秀研究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和鼓励。

1984年初，陈独秀的一位后人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问题。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独秀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的文章，澄清陈独秀的历史是非，恢复陈独秀的本来面目。同年11月，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召集有关专家开会讨论中央党

史研究室有关陈独秀问题的送审稿。会上，胡耀邦指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独秀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他。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不犯错误是很难的。为此，胡耀邦提出：写陈独秀这样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前人，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

经过多次修改，《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发表。在五四时期和建党问题，文章对陈独秀的评价是：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这里，首先肯定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是主要的。那个“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的尾巴，可轻可重，但显然是一分为二式的次要地位。文章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看法，在推动对陈独秀的科学研究和公正评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如何评价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总是宣传李大钊更多一些，似乎李大钊的历史功绩高于陈独秀。但从历史事实看，并非如此。

此后，关于陈独秀在建党中作用问题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有学者指出：之所以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应属首位”，是因为陈独秀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以《新青年》为阵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党准备；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理论上的建党准备；三、亲自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准备。

同时，学者们通过计量分析指出：陈独秀在一大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绝非过去所说是党的幼稚，也不仅仅是由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显著声望，更不是什么“错误的选择”，而是一种众望所归：

从一大党员组成看，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